

第五章 研究探索成果

作為一名思想探索者和學術研究者，顧準是從 1955 年 9 月進入中央黨校沉潛學習，下定決心不再謀求仕途並轉而從事探索研究開始的。在將近 18 年的研究與反思歷程中，顧準所涉獵的學科領域極為廣泛，涵蓋了哲學、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等等。而論及顧準的研究探索成果，若按其研究重心與志趣的時間先後，可以概括為兩個部分：一是經濟領域，此一研究又可分成兩個階段。首先，顧準在 1957 年《經濟研究》第 3 期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以下簡稱〈試論〉）提出市場取向的構想，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可以試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顛覆當時人們對於社會主義體制注定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自發波動來調節生產的認知，因此是極具突破性的理論發想；其次，顧準的經濟研究主題還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形成與發展的論述，時值文革期間與其胞弟陳敏之私下的思想交流，所以是以信函、筆記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他透過歷史研究的視角，指出資本主義之所以源起並發揚於西方，來自於西方社會當中有關法權體系、民族國家的制度基礎，以及重視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精神文明。然而，反觀中國文化當中根深柢固的專制主義和史官文化，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萌芽、生根與茁壯。

顧準的另一研究成果則是在政治領域，主要關注在兩方面：第一、顧準的間接民主思想是其政治研究中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於文革期間「大民主」理論的無限上綱，帶給中國政治與社會極大的動盪與不安，見證運動亂象的顧準遂檢討這樣的民主現象，回顧近代中國的民主實踐和西方民主發展的歷史，並援引當代民主理論，進而提出真正的民主應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亦即中國的民主只能實行代議制和兩黨制的「間接民主」；第二、從顧準的《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來看其對於古希臘城邦民主發展的探索與發現。顧準研究古希臘城邦制度的目的，在於他想要了解與釐清：最原始的民主制度為何會起源於叢爾小邦林立的古希臘？而其終極目的則是透過中西方的比較研究視角來確認，未來的中國若要實行民主制度，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民主制度以及要創造什麼樣的積極條件。

第一節 經濟研究（一）：「市場取向」的提出

根據中國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在文革時期與顧準有過忘年之交的吳敬璉指出：「顧準是在中國經濟學發展史中提出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人。」因為正是在 1950 年代中期，顧準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以下簡稱〈試論〉）這篇論文裡，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亦即提出「讓價格的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¹回顧 1950 年代的中國大陸，正處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已完全被意識形態化的時候，中共其後更打出「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激昂口號。此時的顧準為何主張顯然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市場取向」政策，他這一觀點產生的思想路徑為何？將是本節所欲探討的重點。

1989 年至 1991 年間的東歐民主革命，導致蘇聯和其他正統共產主義國家的崩潰，因而引發了政治自由化和市場經濟改革的風潮。例如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在其著作《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宣稱，自由主義的力量已經擊敗共產主義，促使全球皆朝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前進，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將是這場歷史之戰的最終勝利者，而建基在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之上的社會將是無法抵禦、不可逆轉的歷史現象。²儘管在某種程度上，上述以「西方中心論」為主體的論點存在文化沙文主義的傲慢心態，然若檢驗世界時局的變化，卻也證明以蘇聯為核心的極度中央集權化經濟模式的失敗，確是不爭的事實。而 1950 年代顧準提出「市場取向」的政策呼籲，很明顯即是對於計劃經濟理論與體制批判性的否定。但試問：共產主義的創立者們在擘畫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時，為何會拒斥市場而選擇計劃？計劃經濟體制在蘇聯實踐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吳敬璉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拒斥市場經濟有兩個原因：一是反市場的激烈態度。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初期，由於市場秩序及彌補市場失靈的社會機制沒有建立，使市場制度在成為促進生產力極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強盜資本家」掠奪財富的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下層群眾形成對市場制度的畏懼和敵視心理，把市場制度視為資本主義罪惡的源泉。³二是馬克思提出實行計劃經濟是與其「社會化大工廠」思想相關聯的。亦即：

¹ 邢小群，〈思想使人受難，受難使人思想——吳敬璉談顧準〉，載於陳敏之、丁東編，《顧準尋思錄》（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頁 350-361；吳敬璉，〈中國需要這樣的思想家——紀念顧準誕辰 80 周年（1995 年 3 月）〉，載於吳敬璉著，《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頁 609-618。

²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2001），頁 51。

³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頁 2-6。

(馬克思和恩格斯) 把生產社會化和單個企業的大型化看作同一件事，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現了企業規模日益擴大，逐漸合併成唯一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趨勢，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當這個企業擁有的生產資料轉歸社會共同占有時，自然就會把整個社會變成在「自由人的聯合體」共同控制下的大工廠。⁴

準此，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下的「社會大工廠」中，當然也就可以像資本主義社會的每一個工廠內部一樣實行計劃體制，依此而論，「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說出了和早期社會主義者相同的結論，認為在公有制條件下，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和市場關係都將消亡。」⁵

吳敬璉的兩點解釋是具有說服力的，但是，若追本溯源地探究共產主義的理論發想源頭，還可以進一步確認，馬克思之所以創立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無疑是為了實現「平等」這一終極目標，亦即謀求全人類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而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裡，人的解放是不可能實現的。要之，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們主張在社會主義中實行計劃經濟制度、否定市場制度，是與追求「平等至上」的人類解放的價值目標密切相關的。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指出，實行計劃經濟必須基於以下兩個條件：一是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在工業大生產發達、物質產品極為豐富的資本主義規模之上建立；二是社會主義的建立將是一個世界性的事件。⁶然而，歷史的演進卻正好與上述設想相反，也就是由資本主義不發達的蘇聯開始了一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蘇俄共產黨自執政後即力圖實現由馬克思所擘畫的烏托邦夢想，但在當時卻沒有具備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豐富的物質基礎和社會主義的世界性，對蘇聯來說就是「發達的工業化」和「相對和平的環境」。因此，蘇聯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必須要實現「平等」的目標價值，更要為實現此一價值創造條件—商品的豐富性和革命的世界性。易言之，蘇聯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總是試圖追求社會主義的目標價值以及實現這一價值的目標條件的結合。然而，兩者之間卻存在著緊張的對立關係，畢竟，追求豐富的物質基礎就必然要以講究經濟效益為原則，並且實行競爭的規則，而這一定會帶來分配上的不平等，從而違背了最終的目標價值。

⁴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頁 11。

⁵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頁 12。

⁶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頁 8-13。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可以說是列寧為追求目標價值實現所付出的努力，但是目標條件的缺乏迫使他不得不去為實現目標而創造條件。其手法對外是輸出革命以造成社會主義世界性的到來，對內則是運用實現目標價值的計劃手段去創造物質基礎和經濟發展。儘管 1918 年前後的列寧的確相信計劃體制能夠實現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而事實也證明「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所實行的嚴格的計劃，有效幫助蘇維埃政權挺過國內戰爭的危機，但是這種對生產與分配進行計劃的作法卻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於是在國內戰爭結束後，民眾不滿的情緒加劇，列寧體認到：「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⁷於是，1921 年 3 月 21 日的俄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了「新經濟政策」，代替了先前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顯示列寧在他前一努力所造成的危機之後，把目標條件的優先性置於目標價值之前，而這實際上也反映列寧的社會主義藍圖中，已把效率—工業化的迅速實現、經濟的發展、物質資源的豐富—優先於平等。為了實現這一目的，1921 年 3 月列寧在俄共的十大報告中指出，目前最迫切的就是採取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只有經過這種辦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又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⁸因此，列寧在體制上已自覺地實行了市場經濟取向。這實際上也就是說，通過「戰時共產主義」的實踐，列寧體認到，在資源配置、追求效率方面，即在追求社會主義目標條件方面，市場經濟較計劃經濟為一更好的選擇。

直到史達林執政後，由他所創立的社會主義模式，基本上是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反動，以及某種意義上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回歸，但正如列寧先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時所面臨的形勢，史達林必須設法實現目標條件的任務—豐富的物質基礎和革命的世界性，就其國內建設來說，發展和效率就成為在計劃體制下必須追求的目標。於是，在蘇聯社會經濟現狀及理論思想中，一種弔詭的現象就出現了：一方面將計劃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畫上等號，市場規律遂被排斥在外，例如史達林說：「價值法則在我國發生作用的範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我國的制度下，價值法則不會起生產調節者的作用。……不容置疑，在我國現今的社會主義生產條件下，價值法則不能是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方面的『比例調節者』。」⁹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客觀的局部範圍內的存在，以及對經濟效率的追求，又不得不承認價值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因此，史達林又說：「有時人們問，在我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不是存在，是不是發揮

⁷ 列寧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論新經濟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94。

⁸ 俞敏，〈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論黨的政治價值觀〉，《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武漢），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62-65。

⁹ 斯大林（Joseph Stalin），《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 19、22。

作用呢？是的，是存在的，是發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價值法則。」¹⁰

綜上所述，允許價值規律的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容納市場因素的存在。其實早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28年—1932年），史達林在全民所有制內即保留了商品—貨幣的形式，並實行經濟核算制，而為了落實經濟核算就必然要考慮價值規律、市場因素。對此，吳敬璉認為蘇聯所建立的計劃經濟並非「純粹的計劃經濟」，而是運用國家計劃來配置資源的基本框架的條件下，吸收某些市場的因素（所謂「利用價值規律」）來刺激人們的積極性的體制。¹¹也正因為蘇聯經濟理論與現實的混淆和差距，而給予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理論探索和改革的空間。

回顧中共建政初期的經濟發展策略，儘管計劃經濟在中國是1956年才建成，但在建立的過程中，自從一五計畫實行統購統銷之後，計劃體制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弊端亦隨之浮現。由於計劃經濟乃是由少數中共領導人居於指揮中心，把億萬人民生老病死的需求、國家生存發展之所需等，統統納入計劃之中。所有生產、分配、投資、流通等各方面的重要決定，皆由黨中央、國務院發號司令。然而，中國地區幅員遼闊，經濟計劃又包羅萬象，制定程序亦十分繁複，工廠、企業、合作社等經濟單位數以萬計，加以各單位規模不同，生產設備和技術都有很大差別，再加上統計數字不全不實，自始即缺乏健全的基礎。因此，這種計劃經濟實際上是盲目經濟。¹²正是基於此，自1956年起，中國經濟學界和政界都已開始反思這一體制，如政府系統中，陳雲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¹³的思想就是典型代表。為此，中國經濟學界對價值規律和商品經濟等問題亦展開討論，這些可以說是顧準提出「市場取向」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不過，顧準提出「市場取向」觀點的思維起點，卻又不單是針對當時中國經濟實際發展而開啓的。

顧準是在〈試論〉一文中提出市場取向，而關注價值規律問題則是他理論思考的原點。從顧準現有的經濟研究資料來看，顧準的〈試論〉應是他在前期兩篇

¹⁰ 斯大林（Joseph Stalin），《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頁17。

¹¹ 吳敬璉，〈論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載於吳敬璉著，《吳敬璉自選集（1980—2003）》，頁25。吳敬璉認為，真正「純粹的計劃經濟」，只存在於蘇聯戰時共產主義的短暫的時期。

¹² 林理建，〈中國大陸經濟五十年回顧〉，載於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主編，《中共建政五十年》（台北：正中書局，2001），頁82-105。

¹³ 陳雲在中共八大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行「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濟是國家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一定範圍內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陳雲此一設想，不僅突破蘇聯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思維，而且更涉及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合法存在並充分發揮其作用的問題。這個設想隨即被中共八大決議所採納。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93-306。

文稿基礎上發展而來，這兩篇文章分別是 1956 年 7 月 12 日寫就的〈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以下簡稱〈體會〉）和同年 9 月 26 日所寫成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一個讀書札記〉。而若要釐清顧準提出市場取向的思維路徑，則有必要將這三篇文稿連貫在一起討論。

如前文所述，1955 年 9 月，顧準進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由於對經濟領域的專業和興趣，加上黨校課程安排使然，使得顧準從 1955 年 11 月底起即以極大的興趣開始對《資本論》的閱讀和學習。在這本經典著作的幫助下，顧準對於貨幣、價值、商品生產、剩餘價值學說、經濟生產等等經濟學概念與理論有較為清晰的認知。此外，顧準又延伸閱讀了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的經濟學理論，憑藉著這些經濟學的理论知識，顧準遂在隔年（1957 年）提出自己對於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經濟主張。

顧準運用經濟理論首先分析的對象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這顯然是受到馬克思《資本論》問題意識的影響。在 1950 年代，顧準還沒有對資本主義進行整體的研究和分析，較為宏觀的理論梳理要到文革期間才開始，此時的顧準所關注的焦點是「資本主義克服危機的生命力何在」¹⁴的問題，起初，顧準推翻了資本主義生命力是「靠殖民地來克服危機」和「工人貴族的腐蝕作用」而維繫的觀點。顧準的分析最後定調在兩個方面，第一，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生產力的飛快提升、和二戰後進入原子時代所產生的新技術革命的推波助瀾下，保持活力；第二，在吸取先前經濟危機的教訓，提出新的經濟政策，如凱恩斯政策以拉動經濟增長，避免嚴重危機及蕭條的出現，以保持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儘管，顧準對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最終仍抱持否定態度，並且深信「滅亡仍是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命運。」¹⁵但由上觀之，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現狀以及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已成爲他反思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參照物。

顧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與政策進行反思是與蘇共二十大事件的衝擊密切相關的。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所暴露出的問題成爲顧準反思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分析依據。例如，顧準在 1956 年 7 月 12 日所寫的〈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他在文中先是贊同毛澤東所提出的「用多發展一些輕工業和農業的辦法來發展重工業」，其論證的資料即是以蘇聯實行犧牲農業、輕工業而發展重工業所衍生的問題來作爲例證。¹⁶因此，顧準在日後便說〈試論〉一文的寫作是爲了反

¹⁴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231。

¹⁵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49-50、61-62。

¹⁶ 顧準，〈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3-4。

思「幾十年來蘇聯農業停滯不前這一可怕的教訓」。¹⁷再者，當時中國社會上下普遍瀰漫著反思與重新估價「蘇聯典範」的氛圍。例如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談話，強調要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¹⁸另外，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則是針對實行統購統銷後在經濟上出現的弊端，提出「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理念，主張在計劃經濟範圍內，實行一定的自由市場。由於中共領導人對於蘇共二十大事件的反思態度和探索，間接促使顧準重新評估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制與政策，而顧準在 1956 年 7 月所寫的〈體會〉一文，可以說就是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中的經濟關係和陳雲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理念的回應。

若論及經濟問題中的價格問題，自然就會牽涉到價值和價值規律的概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價格、價值和價值規律等有過詳盡的論述，而顧準在該書中就發現了馬克思對在社會主義下的價值規律該如何發揮作用的一段話：「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後，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決定就仍然在這樣的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後，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重要。」¹⁹顧準引述馬克思的這段話，意思很顯然是指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仍佔有支配作用，但馬克思此一主張卻與史達林的觀點大相逕庭，史達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則是指出：「價值法則彷彿調節著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比例』」的論斷是完全不正確的。²⁰由此觀之，由於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針對同一問題出現不同的論斷，遂引發顧準強烈的理論知識興趣，而顧準自此後亦開始探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規律問題。

顧準對價值規律理論問題的探討，基本上是與 1952 年之後「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政學界對於各種規律問題辯論相呼應的。針對過渡時期，史達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書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內容和作用做了論證和訓示，他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概括為：「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²¹然而中國時值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它的基本經濟法則或規律為何？為此，中國政學界展開大規模的學術討論，而對於這一時期基本經濟規律的共識則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其他如現代資本主義中的價值規律、剩餘價值規律等也會相應存在，

¹⁷ 顧準，《顧準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 356。

¹⁸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267-288。

¹⁹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 1115-1116。轉引自：顧準，〈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頁 23-24。

²⁰ 斯大林（Joseph Stalin），《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頁 20。

²¹ 斯大林（Joseph Stalin），《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頁 35-36。

但作用受到限制和拘束。²²上述觀點係以中國過渡時期多樣經濟型態並存的實際情形為依據，進而肯定價值規律在中國的存在與作用，但這種觀點大體上是從屬於史達林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論調，即價值規律所發揮的作用應是局部的、被限制的。

直到 1956 年蘇共二十大後，中國經濟學界開始對史達林在價值規律方面的理論進行反思與檢討，時任國家計委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就主張，價值規律雖然在中國的國民經濟總體上起的是「輔導作用」，但卻也認為在部分的活動領域內，價值規律是起主導作用的，也就是說，在「用直接計劃來管理的經濟活動」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只作為核算工具；在「間接計劃來管理的經濟活動」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而在「國家計劃管理範圍外的經濟活動」中，價值規律起自發調節作用。²³另外，顧準在中科院經研所的領導兼好友孫冶方更提出：「價值規律同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不是互相排斥的，同時也不是兩個各行其是的並行的規律……只有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才能使計劃成為現實的計劃，才能充分發揮計劃的效能。」²⁴

不過，相對薛暮橋與孫冶方兩人的看法，顧準的論點則顯得更為開放與前衛，他在〈體會〉文中列舉馬克思和史達林二人對於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評述，並且基於如此不同的觀點，啟發他進一步去探索這個問題。顧準所關心的除了他們為什麼會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還要釐清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該如何定位？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又為何？因此，緊接著〈體會〉後，顧準又寫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一個讀書札記〉（以下簡稱〈札記〉），在〈札記〉文中，他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史達林各自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與價值規律的觀點做了全面的整理和分析。

顧準認為，馬克思與史達林二人對於價值規律的概念意涵是不一樣的。首先，馬克思將價值規律與商品交換的規律做了嚴格的區分，價值規律就是價值決定的規律，就是「由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的量，決定一個使用價值的價值」，而不包含「等價物與等價物相交換」的涵義在內。等價物之可以互相交換的規律，

²² 許滌新，〈論過渡期中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斯大林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讀後〉，《新建設》（北京），1953 年 10 月號，頁 12-14；駱耕漠，〈關於我國過渡時期基本經濟法則問題〉，《經濟研究》（北京），1955 年第 1 期，頁 2-10。

²³ 薛暮橋，〈再論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計劃經濟》（北京），1957 年第 2 期，頁 7-20。

²⁴ 孫冶方，〈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經濟研究》（北京），1956 年第 6 期，頁 30-38。值得注意的是，孫冶方在文末〈後記〉中談到本文的問題意識源起於：「今年初夏，吳絳楓同志就提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來同我研究，並且就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的那一段關於價值決定的引證指給我看。我在那時感覺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孫冶方在此處所提到的「吳絳楓」，就是顧準早年曾用過的一個筆名，易言之，關於價值規律在計劃經濟中的功能與作用，顧準就已經和孫冶方有過交流討論，可以說，正是因為顧準主動就教，才影響孫冶方對此一議題的繼續探討。

馬克斯則另稱為商品交換的規律。²⁵其次，史達林針對價值規律所下的定義是：「價值規律是商品生產的規律，按照這一規律，商品的交換同生產商品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是相適應的。」²⁶由此觀之，可以確定史達林與馬克思對價值規律的認識與定義是不同的，而二者的區別是：第一，史達林把價值規律限定在有商品生產的範圍；第二，把交換的概念加入價值規律內，也就是把馬克思分別定義的價值規律和商品交換的規律合在一起，構成他所定義的價值規律。²⁷

顧準進一步推斷，按照馬克思的定義看來，價值規律與商品生產或交換的存在是沒有關係的。進一步言，儘管馬克思預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並不存在商品生產與貨幣經濟，但價值規律仍舊會在社會主義體制中起支配作用，馬克思才因而主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後，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決定就仍然在這樣的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後，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重要。」²⁸尤有甚者，顧準進一步說：「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著商品生產，那麼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是更為廣泛的。」²⁹然而，若按照史達林的定義來推論，商品生產與交換不存在，價值規律當然也不存在。且現今的社會主義社會實行計劃經濟，即使是商品生產與交換亦只是在部分範圍存在，由此可知，價值規律對生產的作用只能起到影響的作用，絕不能起到支配性的調節作用，且是處在被侷限的條件下的。

對於馬克思與史達林二人對共產主義當中價值規律的爭論，顧準認為此一問題的核心在於：史達林透過計劃體制否定了價值及價值規律，「這個否認，正因為涉及價值實體，所以涉及事物的本質。因而這不僅涉及邏輯聯繫，也涉及於事物內部聯繫的正確認識，涉及根據這種認識，正確地指導實踐的問題。」³⁰顧準這段話的意思是，梳理分析馬克思與史達林二者間對於價值規律的認知紛歧，目的是在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內涵，從而形成正確的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由此可知，顧準所質疑的是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構建的認知原點，以及其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的立論基礎。

顧準認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基本關鍵在於：

²⁵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一個讀書札記〉，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北京：中國市場出版社，2006），頁 311。

²⁶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36。

²⁷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36-337。

²⁸ 顧準，〈學習毛澤東同志「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中經濟部分的幾點體會〉，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頁 23-24。

²⁹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18。

³⁰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37。

當計劃根據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規定各部類的生產規模及其相互間的比例時，是否也被制約於作為客觀經濟規律的價值規律，如馬克思所論證的那樣？是的，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盲目競爭現象不再存在了，價值規律（按馬克思所定義的意義）不再作為自然規律，通過資本家的「競爭，他們間相互的壓迫作媒介」去貫徹了，社會主義社會在制定自己的經濟計劃時，是否要嚴格地計較各類生產的有用效果與所費勞動，如恩格斯所指明的那樣？³¹

顧準在上述文字的最後一個提問，意思是指：該如何實行計劃？計劃是否要按照價值規律去制定？要不要在「注重效益」的前提下執行貫徹？顧準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說：「如果不進行這種計較，怎樣能夠保證最經濟地運用現有的物質力量、自然資源與勞動力，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³²既然社會主義體制試圖要用最有效益的資源配置去實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顧準認為做出最佳配置比例的依據是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而價值規律的作用在調節生產，是通過價格變動來實現的。³³職是之故，當顧準強調社會主義經濟要以價值規律為本時，這就意味著他已認可讓價格變動來調節生產，毫無疑問地就含有「市場取向」的意義了。

從〈體會〉到〈札記〉的寫作過程中，顧準逐漸揭開史達林個人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缺失，緊接著來到 1957 年，顧準洋洋灑灑地寫成近四萬字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一文，雖然還稱不上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顧準已經針對經濟領域中的貨幣、商品生產、價格、價值、價值規律等重要意涵，系統地提出自己的論點，並且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價值規律制約著計劃經濟。」³⁴

延續著顧準的理論思路，既然價值規律制約著計劃經濟，因此，社會主義必須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但要如何運用呢？顧準於是主張：「經濟核算是運用價值規律的基本方法。」而且，「如果不是由經濟核算制來補充經濟計劃，計劃經

³¹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37。

³² 顧準，〈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及價值規律的問題〉，頁 336-337。

³³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74。

³⁴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75。

濟運用價值規律有無法克服的困難之故。」³⁵所謂的經濟核算，就是以企業為單位進行的核算，而歷史經驗已經證明，讓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是不可能的。再者，顧準認為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則可以有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兩種作法，前者的作法，「在理論上認為經濟核算制僅僅是為了使產品能夠計價，產品的計價能促使企業注意成本問題、贏利問題、價格問題，可是價格政策是不能夠也不應該發揮調節生產的作用的。」而後者的作法，「是充分發揮經濟核算制的作用，使勞動者的物質報酬與企業盈虧發生程度極為緊密的聯繫，使價格成為調節生產的工具。」且因為「企業會自發地追求價格有利的生產，價格也會發生自發的漲落，這種漲落就實際上在調節著生產。」³⁶由此觀之，可以說，這種讓價格自發漲落從而調節生產與實現資源配置的作法，就是「市場取向」的思想。因此，從顧準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主張來看，由肯定價值規律為其理論原點，而後更肯定經濟核算為計劃經濟的主要核算工具，顧準的「市場取向」觀點便產生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顧準的結論是採納「市場取向」，但在其〈試論〉一文中，他卻沒有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價值。在顧準的經濟理論當中，他一直試圖在理論上進行一種努力，亦即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揉合在一起，既能追求公平，又能兼顧效率，既強調自由競爭，又做到協調發展。顧準所說的計劃經濟，是一種改造過的計劃經濟，而不是史達林式的絕對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在〈試論〉中，顧準主張：

於是，經濟計劃就成為這樣一種計劃，它規定有關生產分配及產品轉移的全局性的、關鍵性的項目；它規定各個生產企業的經濟指標；但它不是洞察一切的，對全部生產分配與產品轉移規定得具體詳明，絲毫不漏，因而是絕對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計劃因為是全局性的、關鍵性的計劃，因此，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不再任令客觀的經濟規律盲目發生作用了；但經濟計劃又不是具體詳明到這種程度，以致任何企業（或甚至包括任何個人）只要按照計劃辦事，就可以萬事大吉。³⁷

³⁵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75、377。

³⁶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64-365。

³⁷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63。

顧準又進一步解釋，在其預想中的理想計劃經濟，是「某種預見，不是個別計劃的綜合」，因此，「它更富於彈性，更偏向於規定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更減少它對於企業經濟活動的具體規定。」³⁸綜上所述，儘管顧準所提出的「市場取向」主張，未必與中共當今現行經濟政策完全謀合，然而他從現實問題與社會發展規律中所做的探索與發現，卻仍具有相當程度的預見性。因此，若說他的思想正被中國的歷史進程所證實，倒也絕非言過其實。

第二節 經濟研究（二）：

資本主義的產生—西方的制度基礎與精神文明

研究資本主義是顧準研究計劃中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 1950 年代中期，顧準透過馬克思的《資本論》進入對資本主義的研究，當時，他研究的重心與旨趣是現代資本主義，尤其針對 1929 年以後、二戰後的西方資本主義，而其核心問題則是：「現代資本主義為何還有生命力？」通過研究，在 1950 年代末期，顧準就下了這樣的評論：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現況表明，資本主義生產力仍然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得到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論斷，顯然已不符合現代的客觀事實。到了 1970 年代，顧準又對同一問題作更進一步的分析，解釋現代資本主義何以有生命力。關於顧準對此一問題的研究，本文在前一章節已有探討，³⁹此處不再贅述。然而由上觀之，還可以得知：顧準在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研究之後，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演變與發展，更多的是抱持著「肯定」的態度，正如談到中國與資本主義時，他引用了馬克思的話：「這 100 多年中，中國人深深具有馬克思當時對德國的那種感慨：『我們……為資本主義不發展所苦。』」，⁴⁰由此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³⁸ 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頁 365。

³⁹ 參見本文第肆章第四節，頁 68-76。

⁴⁰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06。顧準引用馬克思的這段話，其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的原文中是這樣說的：「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

當然，顧準對於資本主義的罪惡與弊端仍了然於胸，就像他所說的：「資本主義靠原始積累起家，其初期內部剝削十分嚴重，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資本主義的每一毛孔都在滲出血汗，這麼說是毫不過分的。」⁴¹而現代資本主義同樣問題重重，可說是「一大罪惡的根源」，其未來終將會「被批判送終」，「會在批判—改良中一點一點滅亡掉。」⁴²換句話說，顧準一直沒有改變「否定」資本主義的意向，在「肯定」資本主義之際，也絕非全盤性的「肯定」，而是一種以歷史為借鑑的觀念和態度。對於同一事物，肯定與否定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並存著，思想上的緊張性是必然存在的。但顧準基於中西歷史對比研究的視角，與對現實和未來的關懷，認為「間接民主制度與現代化經濟體制」是解決「娜拉出走」問題的兩大關鍵，故其歷史研究自然就集中在兩個核心命題之上：民主和資本主義。

從某種意義來看，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可說是近代人類發展史中一體兩面的概念意涵，現代化的研究就代表著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歷史研究。延續這樣的思路，顧準才會產生如下的研究動機與發問：民主和資本主義為何會產生於西方？它們是如何發展與演變的？以及中西方之間文明比較、資本主義在中國等問題。也因為顧準使用「現代化」這一概念與敘事方式，更使得他對資本主義的肯定態度得以加強，「現代化」的敘事雖也是一種直線性的發展模式，但它除去了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的發展關係，而是在「傳統—現代」這一概念範疇內來書寫歷史，並視現代性為追求目標；既然，現代化發軔自資本主義，那麼，在現代化的敘事當中，資本主義就被顧準賦予較多的「肯定」之意，也正因這樣的「肯定」態度，才使得顧準在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時，更加注意西方世界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

1985年，由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標誌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峰，而這個問題的研究曾被譽為是中國史學界的「五朵金花」。⁴³吳承明在第一章〈導論〉中，首先討論了〈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文中他批評顧準的資本主義研究結果，認為顧準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以及對資本主義產生於西方的特殊性的肯定是「奇怪的」。⁴⁴然而，該文在論證的前提上亦有瑕疵之處，亦即作者並沒有對「什麼是資本主義？」做出概念限定，而逕自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概念。

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時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參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206-207。

⁴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219-220。

⁴² 顧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頁232。

⁴³ 所謂的「五朵金花」是指：中國歷史分期問題、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問題、中國土地制度問題、中國農民起義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見：王學典，《理論、方法、發展趨勢：中國經濟史研究新探》（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前言〉。

⁴⁴ 許滌新等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一卷 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29。

仲偉民即認為，正是因為對「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概念始終沒有搞清楚，以致於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在討論前提上就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此一來，針對「資本主義萌芽」所做出的論證要使人信服是不可能的。⁴⁵要之，在探討、分析顧準對資本主義產生的研究時，首先就要先釐清什麼是資本主義？顧準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又為何？而本研究發現，由於顧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當中特殊性而非普遍性的重視，從而使他對於資本主義產生的研究，有其自成一套的獨特看法，說明如下。

尼采嘗言，只有非歷史的存在才可能被賦予恰當的定義。⁴⁶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具有複雜歷史變遷的概念，確實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確切的定義，加上其涉及政治意識形態，在定義上就顯得更加模糊不定，許多西方學者也困惑於這個概念的泛化與模糊，在使用這個概念時都非常猶豫。歷史學家赫伯特·希頓（Herbert Heaton）即認為：「在所有以主義結尾的詞中，資本主義一詞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義和定義是如此混雜，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學者應該把它同帝國主義一起從詞彙中擯棄。」年鑑歷史學者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也認為該詞已用得太多，主張把它取消。⁴⁷黃仁宇則說：「『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曖昧游離。」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亦較資本主義為佳。」⁴⁸誠然，許多學者都曾提出過這個問題，並試圖在研究中不用「資本主義」這個令人頭疼的詞語，然而，「資本主義」一詞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運用如此廣泛，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致於人們覺得它無論怎樣有局限，都無法另找一詞取代。

如果從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來看，「資本主義」雖是馬克思很少使用或意義不甚明確的詞，但最終仍被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納入該主義的理論模式，並將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社會型態劃分的幾個階段。⁴⁹而顧準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是以 1888 年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英文版所加的一個注釋為認知基準。這一注釋主要在解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差別，恩格斯的說法是：「資產階級是指占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雇傭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

⁴⁵ 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合肥），總第 101 期，2003 年第 4 期，頁 223-240。

⁴⁶ 轉引自：李強，《自由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3。

⁴⁷ 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形形色色的交換（卷二）》（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 194-195。

⁴⁸ 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頁 470。

⁴⁹ 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馬克思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並不確切，實際上，馬克思曾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過這個詞。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有了商品市場上的這種分級化作用，資本主義生產就有了它的基本條件。」另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包含著全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於其中的雇傭勞動，是從古代就存在的。」參見：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著，施康強、顧良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頁 194；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頁 223-240。

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⁵⁰依顧準看來，馬克思對此定義的根本哲學命題在於，只要雇傭關係中是以「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來處理，那麼，這個雇主就是資產階級，而其中的關係和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但要如何才能使這種雇傭關係存在維繫下去？顯然，必須要有自由勞動者的存在。易言之，正因為馬克思把雇傭關係的存在用來定義資本主義，所以馬克思當然將「鳥一樣的自由勞動者的存在作為資本主義的唯一或幾乎唯一的必要條件。」⁵¹儘管，馬克思也在《共產黨宣言》中，將航海、商業和殖民所擴大的市場、蒸氣機和機器的發明等視為資本主義興起的其他因素。

不過，顧準並不認同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定義，而堅持要用自己的「資本主義定義，來對抗馬克思的定義」，⁵²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一文中，顧準把資本主義定義為「產業革命以後那種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而把「產業革命以前的工場手工業，有組織的金融方法，規模十分宏闊的航海、商業、殖民，都看作現代化資本主義的準備階段。」⁵³更同時強調，「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⁵⁴易言之，顧準認為，把雇傭勞動的出現來定義資本主義，不如把產業革命的誕生作為特質更為精確。準此，顧準的定義當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即是，把產業革命視為最根本的促成因素。之所以抱持著這樣的觀點，是因為顧準認為只有把資本主義放在人類歷史進步發展的世界圖景上來看，才能更準確、更有意義地定義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圖景裡，資本主義之所以是有別於或高於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西歐封建社會和東方專制社會的一種「新社會」，肇因於它專有產業革命而不是別的其他因素。正是工業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生命和力量，這力量才使得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並迫使一切民族「在滅亡的恐怖之下變法圖強」，可以說，滅亡的恐怖源自資本主義，而變法圖強之途亦是效法資本主義。⁵⁵

對資本主義不同的定義反映了馬克思與顧準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思想關懷。馬克思之所以把「雇傭關係」視為資本主義的特質，是因為「悲嘆喪失了生產資料的勞動者，被他自己的勞動異化了。」藉此突顯出資本主義對人的束縛與壓迫，而以解放全人類為最終標的。至於顧準用「產業革命」來定義資本主義，投射出他在對比歷史與現實的中西文明落差後，認定中國落後差距之所在，因此視「現代化」為終極目標，反映出他希望中國發展現代化的意圖。

⁵⁰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頁 250；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4。

⁵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4-215。

⁵²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5-216。

⁵³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5-216。

⁵⁴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1。

⁵⁵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5-216。

壹、資本主義的產生—西方的制度基礎

顧準把「產業革命」當作定義資本主義的最核心因素，其考量在於如果用雇傭勞動、市場貿易、工廠手工業、商業興盛、海外殖民地的開展等任何其中一個或多個現象來定義資本主義，那麼，資本主義的產生就不會被西方所壟斷，因為上述這些現象在古代或非西方社會中多少都曾出現過。因此，顧準主張，正由於產業革命誕生在英國，才使得資本主義為西方、尤以英國所特有，而舉凡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由此觀之，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也就是資本主義為何誕生於西方世界的問題，更具體地說，眼前所要探討的是工業革命何以誕生在英國？

當顧準試圖要解釋為什麼是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時，主要是把處於相同文明水準的法國、荷蘭、義大利等國作為參照座標，依此來檢視英國具備什麼樣的特殊條件。但更進一步從顧準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來看，他關注的焦點其實是在中國與西方文明對比的基礎來看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亦即，他是以中國文明為參照體系來檢證西方文明中存在哪些促使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特殊因素，儘管，顧準基於類比研究之便，而將英國相較於其他西歐國家的特殊性也一併視為西方文明的特質了。

為有效地尋找西方世界與資本主義產生有關的因素，同時也為了找出西方世界中存在而中國以及其他文明世界所沒有的特殊因素，顧準曾列舉下列諸項西方文明所獨占的眾多因素：航海、商業和殖民所擴大的市場、蒸汽機和機器的發明、法權體系和意識形態、國家的商業本位的根本態度、文藝復興所累積起來的科學技術、合理經營（包括複式簿記）的知識、宗教革命和上帝選民的意識等。⁵⁶而從上列眾多因素當中，顧準主要從西方的制度基礎和精神文明兩個層面，論述「西方文明與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首先，在制度基礎方面，顧準強調西方的「法權體系」和「國家力量」這兩種因素對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作用。

一、法權體系

顧準認為資本主義不從印度、中國或波斯等文明中產生出來，而是由西方的希臘羅馬文明中產生出來絕非偶然，是因為希臘羅馬文明中存在著「法權體系」這一特徵，並且被顧準自稱為「上層建築決定論」。顧準之所以強調法權體系的作用，不僅是「對抗」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論，同時也是在「對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派的論點，顧準分析認為：

⁵⁶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5。

我們有些奢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產不出來。⁵⁷

準此，顧準進而將資產階級產生於市民階級這一歷史現象作為切入點，來探討西方法權傳統與資本主義的產生。

顧準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一文中說，他在重讀《共產黨宣言》時，發現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著作中表明，資產階級是由市民階級演變而來，而這個市民階級歷史可以上溯到羅馬和羅馬以前，⁵⁸馬、恩兩人的觀點對顧準而言具有極大的價值，因為這代表著：它從歷史的譜系上證明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只能產生於西方文明，因為孕育市民階級的城市共和國乃歐洲文明傳統的一個顯著特點。⁵⁹

把近代城市共和國淵源上溯到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顧準想要強調的是古希臘羅馬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兩大傳統：一是以商業為本位的傳統；二是法權傳統。首先，之所以強調商本位的思維，是因為傳統中國向來則是以重農抑商為既定政策，商業只是依附於中國皇權而存在著的：「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搖錢樹，皇朝決不允許商業本位的城市、城邦的產生。」⁶⁰

不過，為了更有力地論證城市共和國和資產階級的興起，顧準又強調古希臘羅馬所傳承下來的另一個傳統——法權觀念。資產階級與城市共和國起源於古希臘羅馬時代，興起則是在中世紀，此時，西歐處於封建統治時期，城市該如何取得其自治權？顧準由英國學者莫爾頓《人民英國史》中得到啟發，清晰了解城市的市民階級是如何從封建領主手中買來自治權的。莫爾頓說：

（12世紀末，第三次十字軍興起之際）需要額外的現款。這些款項的籌

措方式不一，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賣特許狀。這些城市仍賴耕種他們的公

⁵⁷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1。

⁵⁸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06。

⁵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07。

⁶⁰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09。

地來維持，它們所以與周圍的農村不同，主要是因為市內土地保有權的條件有較為自由的傾向。然而，城市常要負擔種種既無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稅賦。城市漸漸發達，與領主們訂定合同，約定交納一筆總款項，更常見的，交納一筆年租以免除他們的種種義務。要做這事，便不免給予一紙特許狀，設立一個集體負責交租的團體。⁶¹

如此一來，「擺脫私人關係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體』興起了，結果形成了準備加入政界的新階級。」⁶²

然而，囿於歷史經驗和傳統文化的中國人，絕對難以想像市民階級竟能通過贖買來獲取城市自治權。於此，便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意識：西方國家的城市居民階層，在中世紀裡為何可以透過贖買來得到城市自治權？顧準研究過後所得出的解答是，因為西方文明存在著一個法權體系和遵守這體系的傳統精神。學者菲特烈·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即指出：

中國人與其他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政治思想的特色都是倫理而非法律；希臘人則自始就將大部分政治精力放在立法與施法上。像梭倫（Solon）之類的領袖人物，如果生在東方，必然會滿足於以倫理典範去形塑社會，但是在希臘，他們卻發現做個立法者，以適當的憲政改革消弭城邦的派系紛爭，才是最能一展長才的方法。⁶³

⁶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0。

⁶²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0。

⁶³ 菲特烈·華特金斯（Frederick Watkins）著，李豐斌譯，《西方政治傳統——近代自由主義之發展》（台北：聯經，1999），頁 4-5。梭倫（Solon）是雅典歷史上第一位憲政改革者，西元前 594 年被各黨派任命為首席執政官，全權進行改革。他的改革重點主要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前者包括：1. 設置四百人議院（The Council of Four Hundred），允許中產階級參加。2. 准許下層階級有權參加全民議會及充任民眾法庭的陪審員。經濟改革方面，則廢除現有債務，解放債務奴隸，禁止以債務迫人為奴隸。梭倫極具政治洞見，能針對時代之問題而提出解決之良法，以此贏得「雅典民主的先驅」之美名。參見：黃俊傑，《古代希臘城邦與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7），頁 106-109；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台北：三民書局，2003），頁 35。

在顧準看來，西方法律最重要的特徵即是，「法」是與「權」連在一起的，無論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或者是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國家是建立在「公民權利」基礎之上的，且個人權利在理論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國家不得隨便加以侵犯；而當個人、法團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雙方還可以透過法律的途徑解決。但反觀中國，顧準說：「中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權連在一起的。」於是，「在中國，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麼『權利』也談不上，所以，馬克思譏諷中國是普遍奴隸制。」⁶⁴

顧準認為，由於有這一套法權體系的存在，儘管在中世紀時代，西方普遍實行封建制度，這一封建制度實行的是具有嚴格身分等級的一種統治制度，但因建立在公民權利之上的法律體系，讓普世法治的理想能夠臻於實現，並且阻擋國家透過暴力手段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同時，基於這樣的法治體系及傳統，而使得國家與人民用契約的方式來調整他們之間的關係。⁶⁵因此若是在中世紀時，當市民階級與封建領主發生衝突時，只要雙方願意，他們就可以達成契約，亦即城市居民向領主交納一定的贖金，領主則把管理城市的權力交給市民階級。

綜上所言，顧準認為，由於依賴於這一法權體系的保護，市民階級方能得到一定的生存條件，資本主義也進而能夠興盛發展。因此，顧準才會說：「……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決定，什麼樣的經濟結構能夠生長出來或不能夠生長出來。」⁶⁶回頭來看中國無法發展出資本主義，很顯然地，依顧準的看法，西方文明中的法權體系是極為重要的催化劑。

二、國家力量

既然資本主義誕生與市民階級出現息息相關，而市民階級的起源可以回溯到中世紀的城市共和國，如義大利、北歐和西班牙等地的商業城邦，但為何上述這些地區沒有最早發展出資本主義呢？顧準對於資本主義起源的探索，並沒有在「法權體系」單一因素中就此打住，他甚至說：「中世紀的市民階級（Burgher），迥然不同於現代的資本家（Capitalist）。」且「有了市民階級，並不必然從中產生出資本主義來。」⁶⁷這是為什麼呢？

⁶⁴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0-211。

⁶⁵ E·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學方法》（台北：漢興，1999），頁 60-61。

⁶⁶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1。

⁶⁷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2。

爲了論述資本主義與國家力量間的聯繫關係，顧準在〈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一文中列舉出三個向資本主義進軍中「市民階級」的落伍者：一是義大利諸商業城邦和商業共和國，如威尼斯、熱那亞、皮薩、佛羅倫薩等等；二是漢堡、不來梅和盧卑克等北歐商業城邦組成的漢撒同盟；三是西班牙諸城市公社。這三個地區的商業城邦共和國，顧準認爲原先都極有可能發展出先進的資本主義，其中尤以義大利諸邦爲甚，因其「曾經爲現代資本主義舉行過奠基禮：現代銀行及國際匯兌制度發源於此，近代物理學和實驗科學濫觴於此。」但在地理大發現後，義大利終究衰落了，當地居民又回歸到農村經營起園藝小農業。顧準所提出的解答是：「僅僅經濟上的優勢，而沒有強大的軍力和適當規模的民族國家來保障這種經濟上的優勢，那種商業城邦是發展不出資本主義來的。」⁶⁸

再者，國力更爲強盛的西班牙爲何也重蹈義大利的覆轍，原因何在？顧準認爲，這是因爲西班牙「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權，把城市當作金鵝，並且還殺鵝取蛋，以致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紀的威力，又不具有現代的意義。」所以，「如果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只以城市爲取得征服擴張的財源之所，而不保護它的成長的話，那也是長不出資本主義來的。」⁶⁹

由上而論，顧準認爲市民階級所組成的商業城邦，若沒有國家提供強大的軍事力量，則無以保護人民經濟上的財富優勢，同時也無法開闢海外殖民、拓展商業市場；此外，國家還須抱持一種以私人爲主體的商業國策，而不是以國家、政府爲主體的商業國策。如以中國和法國爲例，中國自商代起，手工業就是國營的，漢代開始即鹽鐵國營、清代的廣州十三行亦是「皇商」，這與英國的以私人爲主體的商業本位完全不同，而顧準認爲一切「官辦」的商業或手工業工場是不可能發展出產業革命的；其次，強大的王權，法國和英國都一樣早，但產業革命卻未發生於法國，實乃因：「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因素，不過，路易十四時代的科爾貝主義，即國家出資辦國營手工工廠，也是發展不出產業革命來的。」⁷⁰準此，顧準透過以上的分析論述，想要表達出如下的觀點：國家在資本主義產生及發展的過程中，扮演極爲重要的角色。

貳、資本主義的產生——西方的精神文明

對於資本主義的起源，顧準除了歸因於西方的制度基礎——「法權體系」和「國家力量」這兩種因素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同時從精神文化層面去探討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而他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產生於西方是與其文化中有宇

⁶⁸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2。

⁶⁹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3-214。

⁷⁰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6-218。

宙、宗教特質相關的，而與此相異的是中國，因為中國文化是一種史官文化，這一文化是無法開展出現代文明的。

當焦點放在文化層面上時，西方基督教的文化特質自然吸引顧準的注意，而這正是他寫成〈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一文的背景。顧準指出，基督教是古希臘思想的「宗教化」，古希臘思想的特色則是「思考宇宙問題」，例如數學、詭辯、修辭和文法學，⁷¹而這樣思考超越世俗問題特色卻是中國古代思想付之闕如的。顧準認為，在孔子之前，「識字和文化知識，是『史官』所壟斷的，他們所負責管理的文化資料，無不與政治有關。」且「第一個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為繼承文武周公的道統，所強調的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復成康之治。」是故，顧準相當贊同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的敘述，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史官文化」，顧準並且為「史官文化」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⁷²

顧準之所以將中西方文化內容的差異定位在「史官文化」和「宇宙文化」，其用意在於立基於「近代科學－工業革命－近代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共生關係，透過歷史的視角來探討「為什麼工業革命（近代科學）產生於西方」的問題。顧準認為，古希臘文化中思考宇宙的特質即是近代科學產生的原因，正由於古希臘哲學自一開始就思考「宇宙是什麼組成」的問題，當時的人們在超越政治權威並探究宇宙問題時，「不免對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精緻、纖巧、井然有序感到驚訝。可是對於這個世界怎麼會形成這種壯麗精巧的總原因，卻回答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只有歸之於某一個全能的神祕力量」，而這就為後來西方文明演變為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預留了可能性。再者，由於思考宇宙問題引發數學、文法學、邏輯學和分類學等等的發展，更使古希臘人的思想中形成理性思辨和推理的特質，這種理性思辨的特質之後透過基督教保存、傳承下來。也就是因為這樣的理性主義傳統，遂使得西方近代的數學、邏輯學和天文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成為「實驗科學的不可缺少的工具」。⁷³易言之，西方這一理性主義的思想特質，才能夠解答「為什麼工業革命（近代科學）產生於西方？」此一問題。

顧準特意強調西方精神文明當中「宇宙文化」的目的有二：一是突顯其中所蘊含的理性主義與近代文明的關聯；另一則是強調這一文化中「超越世俗」的特質，為西方文化發展開闢出一個相對獨立與自由的發展空間，從而才有近代科學萌芽的可能。反觀中國的「史官文化」，因「杜絕了無關於『禮法』的一切學問的發展的道路」，⁷⁴當然斷傷中國能夠發展出近代科學的可能性。

⁷¹ 顧準，〈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144-146。

⁷² 顧準，〈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頁 146-147。

⁷³ 顧準，〈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頁 145-149。

⁷⁴ 顧準，〈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頁 149。

顧準除了指出西方文化中的「宇宙性」，尤以「理性主義」為最鮮明的特質，他還強調西方「個人主義」的傳統，而此一傳統和早期資本家敢於與封建貴族王權進行生死抗衡，甚至遠離家鄉、漂洋過海前往新大陸開墾有關聯。顧準認為，這些資本主義開拓者們的勇氣來自於冒險創業精神和「上帝的選民」的意識，這樣的精神則可以綜合表述為「崇尚個人才能，力主個人權利神聖的『極端個人主義』。」也正是基於個人主義的精神，才得以「支持美洲的拓荒者(pioneer fathers)，支持克倫威爾的革命，形成了商業事務中的騎士精神。」⁷⁵顧準還認為，近代個人主義是與中世紀的騎士精神相關聯的，他在〈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文明〉和〈《馬鐙和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譯文及評注〉兩篇文章中有討論到，騎士文明的民族淵源是日耳曼人，相對的，羅馬軍團則是以紀律嚴明的「集體英雄主義」來壓倒敵人的。但是，隨著日耳曼人征服羅馬之後，騎士遂成為隨之建立起來的封建國家的基層階級，也是「世俗的經濟生活中最底下一層的主人」，而憑藉著莊園土地的經濟支持和封建契約的保障，騎士文明才得以延續與發展，並成為近代個人主義的淵源。⁷⁶

既然顧準是從中西文化的比較視角來探討西方何以富強於中國之因，從而提出西方文明中的「宇宙文化」是促成近代資本主義崛起的關鍵因素，那麼，反觀中國所獨有的「史官文化」遂成為顧準批判與檢視的對象。顧準對於儒道墨家間的差異曾進行比較，⁷⁷也清楚中國文化傳統並非單一儒家的本質，但相對於西方文明當中超越世俗的「宇宙文化」，中國百家諸子則可以統合為一家——「史官文化」。例如顧準在評論老子的「道」時，他一針見血地說：

老子的「道」，顯然是侯王的「道」，士的「道」，很難稱之為超脫於既得利益團體之外，玄思冥想那樣的「道」。所以把老子的「道」，和愛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Logos)，或者和伊利奧亞不論哪一個哲學家的自然科學相比擬，都是不妥當的。……《老子》全書，決不是一個在野的聖

⁷⁵ 顧準，〈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頁 218-219。

⁷⁶ 顧準，〈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文明〉，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191-193。

⁷⁷ 有關顧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參見：〈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老子的「道」及其他〉、〈老子的「無名」是反對孔子的倫常禮教的有名論嗎〉、〈論孔子〉、〈論韓非〉，以上皆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

人探索自然的奧秘 (規律) , 或者人怎樣達於至善 , 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學 , 統治哲學。⁷⁸

因此, 顧準認為:「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 商代已然, 至周已經凝固到不可更易的程度了。」而中國的「全部文化和思想都被摠在這一個框框裡, 憑誰都跳不出這個框框。」於是可以說,「先秦諸子哪一個不是……同心合力一步一步把歷史從侯王—孤寡不穀這個階段, 推進到皇帝—朕這個階段呢?」⁷⁹因此, 正是這樣的文化傳統導致了兩千多年的中國的停滯不前。

不過, 雖然顧準強力地批判史官文化是導致中國停滯不前的重要因素, 卻也不是對其抱持全然反對的態度, 畢竟「歷史沒有什麼可以褒貶的, 歷史的教訓所能照亮的只是未來。」他認為史官文化也是有優點的, 例如其中的「歷史主義」, 它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態度, 也因此「中國人沒有滾入過神秘的唯理主義」。只是, 顧準所要反對的是:「歷史主義不能成為史官, 即服務於政治權威的史官。」⁸⁰換句話說, 顧準認為人類或民族要進步, 應該要建立一個不服從權威專制的文化傳統, 而能夠得出這樣的研究結論, 應是與其冷眼觀察文革時期的社會氛圍密切相關的。

第三節 政治研究 (一): 間接民主理論的提出

顧準在針對政治議題的研究當中, 花了極大的心力研究西方的民主文化, 但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的問題, 而這表現在他對於中西文明的差異進行比較研究時, 屢次強調中國的問題意識。因此, 顧準如是說:「研究外國歷史, 研究世界狀況, 都是為了解決我們的問題, 否則那不過是有閑階級的精神遊戲。」⁸¹亦即, 透過對西方民主理論和實踐的研究, 目的是在檢視中國的現代化工程如要能開花結果, 政治條件上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民主模式。顧準的民主思想又可分為兩條主線, 一是主張以間接民主為核心的現代民主思想; 二是對古希臘史進行研究, 分析為什麼古希臘會產生出民主制度? 本節主要探討顧準所主張的現代自由憲政民主的基本形式—間接民主, 儘管嚴格來說, 但更重要的是去探究顧準為何能在文革時期便提出間接民主的主張, 且這樣的主張, 點出中國在主觀上對民主強烈的期盼與客觀上實踐民主的可能性之間, 確實存在著巨大的矛盾。

⁷⁸ 顧準,〈老子的「無名」是反對孔子的倫常禮教的有名論嗎〉, 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 頁 273。

⁷⁹ 顧準,〈老子的「無名」是反對孔子的倫常禮教的有名論嗎〉, 頁 273-275。

⁸⁰ 顧準,〈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 頁 154。

⁸¹ 顧準,〈關於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筆記〉, 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 頁 349。

顧準對民主問題進行思考與研究始於 1960 年代。此係顧準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為配合中共中央「內部讀物」出版計劃，翻譯當代西方學術前沿著作以介紹外國自然學科、社會科學思潮和文藝創作，他所參與翻譯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這部譯作對於他在之後有關民主的思想與理論認識有極大的影響。而當時序來到文革時期，顧準親眼目睹了「大民主」所帶來的「充分實踐」，亦即中共無所畏懼地讓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不過，「大民主」並非真正的自由，因為它並沒有法律約束，而且有意去打破法律，任由群眾進行創造和發揮，然而終究必須囿於毛澤東主義的框架內，不允許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沒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個人意志凌駕一切，最終造成政治與社會的種種亂象。⁸²

如果把毛澤東晚年的「大民主」思想與西方的民主思想作一比照，就會發現，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在兩個方面和西方民主理論產生背離。其一，「大民主」是一種「手段」，而不是近代西方民主所訴諸的「目的」，其形式實際上被作為專政的手段，同時又用這個手段來解決社會群眾的問題，最後造成理論上的極大混亂，在實際生活中衍生嚴重的後果，文革中雖然是大字報鋪天蓋地，人人都寫，人人都貼，但在意識形態上卻比過去無論什麼時候都更輿論一律；⁸³其二，若論及民主的形式，英國政治學者赫爾德（David Held）認為可以分為兩大形式：直接的或參與的民主（direct democracy 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有關公共事務的一種決策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公民是直接地介入），以及自由的或代議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一種利用民選官員的統治體系，這些官員在「法治」的架構下「代表」公民的利益和觀點）。⁸⁴依此而論，古希臘的城邦民主採取的是直接民主的形式，人民有權參與行使權力；而近代以後發展起來的現代民主多為間接民主，其中「代議制」被推崇為是它最好的實現形式，人民不直接參與行使國家權力，而是通過選舉代表來實現對國家的統治。很顯然地，毛澤東所推行的「大民主」絕非自由主義式的精英式民主，而是一種直接參與的大眾民主模式，或者說是具有民粹主義性質的民主。

文革時期，由毛澤東所發動的「大民主」運動，這場表現形式為直接民主的民粹運動，在當時雖然對於反對官僚主義發揮一定的作用，⁸⁵但它卻帶給中國社

⁸² 王力雄，〈毛澤東主義和人間天堂〉，載於宋永毅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頁 203-234。

⁸³ 毛澤東歷來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雖然他在文革中鼓動的「大民主」同樣有著明確的目的，但這種以高度意識形態專制為前提並以強化這種專制為目的的「大民主」，與現代法制意義上的民主和言論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參見：龔小夏，〈文革及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 2-29。

⁸⁴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著，李少軍、尙新建譯，《民主的模式》，（台北：桂冠，1995），頁 5-6。

⁸⁵ 例如有學者從積極意義上來看待文革，認為文革實際上增進了農村農民的民主意識，並且讓村幹部意識到他們不能再壟斷村中的權力。參見：韓東萍，〈文化大革命與中國農村政治的民主

會與政治更多的混亂與災難。在這個「萬歲不離口」的時代，政治正確成爲最大的關懷，它決定每一個人在中共黨國體制中的地位、所享受的生活品質，甚至於榮辱生死。政治正確雖不一定能致人於九天之上，政治不正確卻一定能致人於九地之下，成爲千夫所指的政治賤民。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政治吞噬其他人生層面的時代，也是「個人理性」必須以「政治瘋狂」示人的時代。對身處在政治風暴之中的顧準，他並沒有簡單的予以否定了事，而是針對文革的民主現象，結合西方民主歷史及理論與中國近代民主實踐的基礎，從理論上對民主與中國等問題進行探討，最終提出真正的民主只有建立在科學之上，且中國的民主只能實行代議制和兩黨制的間接民主。

由顧準的間接民主思想觀之，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熊彼得的民主思想，如前所述，這是因爲顧準在 1963 年翻譯了熊氏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該書有大量的篇幅對民主理念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例如民主的定義、條件、程序、歷史，以及民主中的個人、如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與民主等議題。熊彼得認爲，所謂的民主並不是也不可能是指人民進行統治之意，民主只能是一種方法。在民主制度中，「人民的任務是產生政府，或產生用以建立全國執行委員會或政府的一種中介體。」而「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爲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換句話說，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因此它是一種「政治家的政治」。⁸⁶熊彼得認爲這實際上體現了民主政治的原則，亦即此一原則僅僅意味著，「政府的執政權應交給那些比任何競選的個人或集團獲得更多支持的人。」⁸⁷

依此而論，熊彼得這種民主理論實際上是「精英民主論」，它可以歸納成以下幾個要素：

- 1.民主不意味著人民的政治，而是社會精英的統治。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政治家的政治。
- 2.民主意味著多元的精英競取權力的過程，這一過程往往採取政黨競爭的方式。

化—北方農村文革中心變遷》，載於羅金義、鄭文龍編，《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1997），頁 173-196。

⁸⁶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頁 310、327-328。

⁸⁷ 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著，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頁 314。

3.在民主制中，公民預期政治精英成為政治決策者；同時，公民以利益團體的形式影響決策，而利益團體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則是政治精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4.精英是開放的，人們有平等的機會成為精英。⁸⁸

精英民主論實際上是想解決在民主理論上的首要難題，即民主該如何實現？該實行什麼樣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制亦或是間接民主制？對此，顧準深受熊彼得的民主思想的影響，而主張實行間接民主。

顧準首先從理論上探溯直接民主的根源，他認為最早實現直接民主的是雅典城邦，而之後的羅馬在經歷了短期的王政後，也曾實行過雅典式的直接民主。不過，雅典和羅馬兩個時期所實行的直接民主，充其量只能稱做為「公民的民主」而非「全體人民的民主」。至於法國大革命期間所實行的國民會議，顧準則說：「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風尚是要復共和羅馬之古，亦即復直接民主之古。」相同地，當馬克思在〈法蘭克內戰〉一文中提倡直接民主，其實際上一方面是要消滅異化，另一方面也是要復古——復公民大會之古，也是復共和羅馬之古。⁸⁹

從上述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不同政治團體皆試圖重塑民主的原型，亦即在復「直接民主之古」當中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理想，然而面對這樣的可行性，顧準透過歷史經驗的考證來分析此問題，堅決地回答道：「不可能做到人民當家做主。」他解釋：

歷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於「城邦」中。現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還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變得越來越大了（注意西歐共同市場向西歐聯邦發展的趨勢）。勢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與行政權並存，有政黨，輪流執政的民主國家。

在這樣的區域遼闊的國家裡，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的、

⁸⁸ 顧昕，〈譯者後記 以社會制約權力——達爾的多元主義民主理論與公民社會〉，載於達爾（Robert A. Dahl）著，顧昕、朱丹譯，《民主理論的前言》，（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177-198。

⁸⁹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247。

代表大會的、一黨制的民主，勢必成為以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和榮譽和良心」來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乾脆一點，獨裁國家。

別的結果是不可能有的。⁹⁰

如果是國家的疆域過大而使得直接民主窒礙難行，那麼若退一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城邦式的公社制，又是否能夠實現直接民主制的理想？顧準指出馬克思的〈法蘭克內戰〉一文就試圖為「新法蘭西政制」描繪一幅圖畫，主張法國各城市都組成巴黎公社式的公社。然而，顧準用詰問的方式來反駁這種公社制度的可行性，他列舉如下四點：

一、直接民主制中不存在執政黨和反對黨。可是公社內部無可避免地會存在政策互有區別的政派，那麼該如何處理所謂的反對派，難道把「反對派都歸入反革命派，加以消滅？」

二、各公社將組成一個共和國。那麼，「共和國要不要一個中央政府？如果要…『塊塊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尤其如果徹底取消私有制，『塊塊之間』的產品交換怎麼辦？按《反杜林論》，塊塊之間的交換決不可以通過貨幣，那麼通過什麼？」

三、〈法蘭克內戰〉主張官僚機構要徹底打爛，「要恢復雅典時代的簡直沒有行政機構的作法。」行嗎？

四、「取消常備軍。這事實上是恢復雅典和共和羅馬的、民兵的、公民的軍隊，行嗎？」⁹¹

由上觀之，顧準認為以公社為基本單位來實行直接民主亦不可行。猶有甚者，他還以列寧意圖在蘇聯實行直接民主的失敗經驗為例：

列寧相信直接民主，他甚至有充分的勇氣，在布列斯特和約訂立之後，解散了全部軍隊，用赤衛隊（亦即公民的民兵的軍隊）代替常備軍。他說，「機關」，不過是會計和打字員，可以由無特權的雇員組成；他說，群眾

⁹⁰ 顧準，〈漫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頁 388-389。

⁹¹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47。

的統計監督可以代替企業管理和政府閣部。列寧的計劃委員會是由技術專家組成的，它不是什麼經濟管理機構。⁹²

然而，最後的結果卻是：「蘇聯的軍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職業軍隊；它的官僚機構是最龐大的機構……以工廠蘇維埃和農村蘇維埃為基層的直接民主制，列寧生前已被工廠的一長制所代替；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嬗變為一切權力屬於黨，再變而為一切權力屬於斯大林。」⁹³

顧準由人類的民主實踐和歷史經驗判定，實現絕對的人民當家做主是不可欲的，因此他思考著：「問題的焦點，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當家做主，而來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⁹⁴要如何使人民盡可能的對政治的影響力量最大化？顧準遂得出這樣的結論：實行間接民主，即實行議會制和兩黨制。

顧準主要從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逐漸高度分工化的角度來說明間接民主的必要性。他說：

現代社會高度分工，一個工程師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談政治，極可能是極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進化到極高度的時候……政治也是一種專門的行業，有政治家，他們精心炮製政綱，爭取群眾擁護，以期取得政權。可是，在台上的時候，他們的地位也不過是瑞士的外交部長而不是大元帥陳毅，下台的時候，當一名教授，這對於民主的神聖含義，又褻瀆了多少呢？何況，現在全世界，還遠沒有到這個程度，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能夠做到當前掌握行政權的人不發展成為皇帝

⁹²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48。

⁹³ 同上註。

⁹⁴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54。

及其朝廷，已經很不容易了。奢望什麼人民當家做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會淪為借民主之名實行獨裁的人的擁護者之列。⁹⁵

顧準之所以贊同以議會制為核心的間接民主，主要是從兩方面來闡述的，第一，由議會的變革史來論述議會的合理性；第二，從理解議會所存在的客觀弊端來論述議會制的可取性。

首先，顧準指出議會乃西方國家在從封建國家過渡到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由等級議會逐漸形成起來的。「議會，是在等級君主制的根子上長出來的。最初的英國議會，只有一個等級：諸侯。」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生長起來了，商業發達了，關稅成了王室的收入了，王權利用城市來搞統一。議會的成員，從諸侯這一個成分，擴大到城市代表，……」因而顧準說：「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漸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⁹⁶正由於議會中的各股勢力目的在爭取自身權益，將議會當做利益競逐的角力場，之後才逐漸進化而成議會政治。

進一步言，顧準認為，歐洲封建君主制底下存在的權利義務傳統，最後發展出議會政治的特色。他以英國大憲章為例證，由於英國王室違反慣例，侵犯諸侯利益，各諸侯遂聯合起來在等級議會上進行反抗，最終才通過了大憲章這部法典，其中例如大憲章規定「朝廷要徵收錢款必須取得議會同意」，遂發展出「不出代議士不納稅」的口號。而之後更成了「資產階級的鬥爭武器，逐漸擴大成爲『人民當家做主』的號召。」從議會演進史來看，雖然最初君主與諸侯間的鬥爭僅屬於統治階層間的鬥爭，本來和農奴等下層階級沒有相關，「但是少數特權人物之間的鬥爭，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並不完全通過暴力，只要這種鬥爭的每一個方面，按照這種章程，必須力求取得群眾的支持，它就勢必要發展成爲議會政治。」⁹⁷顧準接著推論，議會制度的出現使國家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分屬議會和朝廷，於是演進爲後來的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而且，一個具有立法權的議會，勢必會演化出政黨。「通過一個議案時的贊成派，演化成爲執政黨，反對派演化成爲反對黨。」⁹⁸因此，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兩黨制正是由此演變而來，且議會政治所蘊含更重要的價值是，「唯有一個有立法權的議會，才使政治和政策，成爲公開討論的對象。否則的話，政治和政策，永遠是由『時代的智慧 and 良心』

⁹⁵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54。

⁹⁶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45。

⁹⁷ 同上註。

⁹⁸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45-246。

躲在警衛森嚴的宮廷裡作出決定。」⁹⁹由此觀之，政治民主化之所以能夠確立，是因為議會的存在與發展而演變來的。

誠然，顧準通過對議會歷史的考察，將議會在政治民主化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看的如此重要，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肯定議會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認的，議會在實際運行當中，確也存在著許多弊端，顧準便不諱言，議會政治的確存在「我們看不慣的地方」：

議會裡有一套「戰術」，為了阻撓議案通過，可以有冗長的演說發言，可以有議員互相拋擲墨水瓶，可以動武。通過一項法案時，要「三讀」，討論法律條文時咬文嚼字。無關重要的議案，也按正式的議事程序，可以有演說者對空座侃侃而談的奇觀。選舉時會有五花八門的「抬轎子」，請客，地方大亨（杜月笙這一流人物）包辦選舉等等，當然也少不了大大小小的賄賂。這些都不過是形式。更使某些哲學家看不慣的是，這全套東西表明一個民族沒有領袖，缺乏領導，也就是等於沒有「主義」。而且，那種咬文嚼字的議會討論，真叫做庸人氣息十足。¹⁰⁰

面對議會政治所衍生的種種弊端，顧準這樣解釋：「至於弊病，哪一種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沒有的。這個人世間永遠不會絕對完善，我們所能做的，永遠不過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更重要的是，「唯有有了真正的議會，不僅政策受到監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監督。你別看清談館的議會，我們的代表大會中，章乃器對預算提出一個問題，財政部還忙了幾天呢。眼睛越多，無法無天的事情愈可以減少。」¹⁰¹顧準亦反過來對當時中國的一黨專政制度提出批判，他說：「『一個主義一個黨』的直接民主，即使做到了民主（當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為獨裁），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¹⁰²再者，「有了多元主義的政治，兩黨制儘管表面上看來選民只有有限的選擇的可

⁹⁹ 同上註。

¹⁰⁰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49-250。

¹⁰¹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52。

¹⁰² 顧準，〈漫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頁 391。

能，它卻是真正民主的—因為有徹底的批評自由。」¹⁰³易言之，兩黨制縱然並非十全十美，但因為人民有在兩黨之間「選擇」的可能，有了「徹底的批評自由」，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民主。

在國家政治當中，為了行政的正常運行，權威的存在是無法避免的，要之，政治上最重要的事便是要防止權威演變成專制主義。針對這一問題，顧準認為：

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占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並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並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台上。如果這一點確實被認為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那麼，伴隨著這種制度而來的一切可笑現象，只能被認為是較輕的禍害。當然，這種禍害也要正視，也要逐漸減輕它。¹⁰⁴

總結之，從顧準的民主思想來看，首先，就顧準的思想流變而言，其現代民主思想是到了文革期間，在和胞弟陳敏之通信時才做較為完整的表述。然而，從他在 1960 年代的日記手稿中，卻也可以判斷他在當時已基本形成了現代民主理念。例如在 1960 年 3 月的日記裡，顧準提到：

政治上取捨的問題，去年秋冬之交在勞動隊裡已在考慮。這一二月來，愈來愈覺得，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後果也不好。四年來的歷史發展似乎在走另一條路 - 自然演化。蘇聯在演化中，所做的不過是過渡作用。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地上天國，矛盾永遠存在，鬥爭永遠存在，而鬥爭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確錯誤」的絕對論維持不下去了。

¹⁰³ 顧準，〈科學與民主〉，載於顧準著，《顧準文稿》，頁 366。

¹⁰⁴ 顧準，〈直接民主與「議會清談館」〉，頁 254。

不同意見的人們必定要組成不同的社團，發展的結果必定是社會主義的多黨制度。¹⁰⁵

其次，從他的理論內容與價值，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熊彼得「精英民主論」為核心的西方議會政治制度的斧鑿。當然，這是與其在 1960 年代翻譯熊氏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思想體驗密切相關的。如今隨著時移勢易，顧準的理論現在看來顯得沒有多大的突破與創見。然而，畢竟他是處在「大民主」喊得震天價響的文革背景，利用西方的現代民主理論，檢視中國的歷史經驗後而提出中國實現現代民主的可行之路，若說他是首倡當代中國思想界現代民主思想之先聲，這樣的說法倒也不為過了。

第四節 政治研究（二）：

《希臘城邦制度》——對西方民主文化的認識

顧準的研究興趣之所以會由經濟領域跨足到對希臘城邦制度的研究，源自他對民主的信仰和對現代民主制的研究，他所思考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民主起源於西方，而不是中國、印度或其他地區？而當顧準在回溯民主萌芽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他注意到正是在如下這段時期，中、西方政治體制開始產生分向發展，他說：

我國的春秋時代，始於公元前 722 年，終於前 481 年，計 242 年，截頭去尾，那 200 年正好是公元前 7、6 兩個世紀。這就是說，希臘史上以寡頭和僭主政治為中介，從王政時代過渡到希波戰爭後雅典民主全盛時代的那兩個世紀，恰好是我們的春秋時代。我們的春秋時代，是從「禮樂征伐」所從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過渡到七雄並立，法家興起，

¹⁰⁵ 顧準，《顧準日記》，頁 261。

以至秦漢統一這麼一個過渡時代。希臘史向民主主義變，我們向專制主義

變。¹⁰⁶

顧準遂從此一研究中更進一步思考：為什麼古希臘會產生民主？於是，他開始了對古希臘史的研究，其主要成果便是《希臘城邦制度》一書，而該研究則是以民主的萌生和演進為核心主題。

顧準是在 1970 年代初期進入對古希臘城邦史的研究，並且在 1974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寫成《希臘史筆記》，¹⁰⁷此即後來在 1982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所出版的《希臘城邦制度》。至於為何顧準要研究追溯西方文明最早出現民主政體的源頭—古希臘城邦時期？陳敏之指出，除了基於他對當時所處之中國環境的刺激，也是基於「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亦即為了有朝一日在中國能實現民主政治，則有必要回頭看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西方已有但中國卻自古即欠缺「實現民主」的條件和原因。¹⁰⁸帶著這樣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促使顧準在這份古希臘史的筆記中始終保持著尋找中西差異的比較研究視角。因為顧準認為，唯有找出中西方的差異所在，方能知道中國可以建設什麼樣的民主，以及建立民主必須先創造什麼條件。

一、「主權在民」理念的產生之因

在顧準研究古希臘城邦制度當中，他相當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古希臘何以產生民主政體；另一則是希臘民主制度的演進過程為何。針對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解釋希臘城邦民主制度的產生之因，有如下幾種說法。第一，希臘民主制是從原始公社的氏族民主制度直接演變過來的，這種說法最早是由恩格斯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所提出的。顧準對此說法提出質問：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解釋，我們就不能不問，一切民族都經歷過原始公社階

段，氏族民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徵，我國也不例外，那麼為什麼我國古

代史中找不到一點城邦制度影子呢？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涉獵一下中國以

¹⁰⁶ 顧準，〈僭主政治與民主—《希臘的僭主政治》跋〉，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160-161。

¹⁰⁷ 顧準，《顧準日記》，頁 429-433。

¹⁰⁸ 陳敏之，〈《希臘城邦制度》讀後記〉，載於陳敏之著，《我與顧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頁 61-63。

外幾個歷史悠久的古代文明 - 埃及、兩河流域、以色列和敘利亞、印度、波斯等等的歷史，我們發現在那裡也同樣找不到什麼城邦制度的影子。我們就不能不懷疑，城邦制度的希臘在世界史上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在古代東方史中，政制的演變倒是具有某種共同之處的。¹⁰⁹

顧準否定了恩格斯所說的希臘民主制度是由原始社會氏族民主演變過來的論點，因為根據 19 世紀末考古發掘的新證據，且通過塞爾格耶夫 (B.C.Сергеев) 的《古希臘史》的介紹，考古學者在克里特島上發掘出的宏大宮殿、陵墓、精美的壁畫、陶器等等，塞爾格耶夫遂認為，在公元前 1600 年，遠古希臘的社會政治制度在許多方面類似古代東方帝國。否則，便難以解釋那些大建築物、多種手工業、奢侈品以及雅緻的玩藝從何而來。依此觀之，若按照東方的例子可以類推，奴隸勞動可能和土人勞動一起使用來建宮殿，築道路、做各種工藝，以致充當海員。¹¹⁰顧準的論點顯然來自塞爾格耶夫的說法，他認為迄今為止所知的遠古希臘歷史的克里特—麥錫尼文明的巴西琉斯 (Basileus)，實際上就如同東方國家中所存在的王，「他們和『東方專制主義』下諸王一樣，是『受命於天』，統治剝削大批勞動人民的『王』。」因此，這些巴西琉斯並非「氏族制度下的民選軍事領袖」。¹¹¹而在這樣的王權統治之下，所謂的「主權在民」理想自然不存在。

希臘城邦民主制度產生之因的第二種解釋則是來自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說法，他將希臘由王制 (君主政體) 向立憲政體的演變歸結於「有才德的人增多」的原因。他指出：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 (君主政體) 所以適合古代，由於那時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諸王都曾經對人民積有功

¹⁰⁹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17。另根據何新的研究指出，恩格斯在撰寫《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時，很可能還沒有讀到當時才公佈不久的亞里斯多德《雅典政制》一書的殘稿（1880 年發現於埃及沙漠中，1891 年以希臘文首次公佈，1893-1903 年出版了全本，而《家族》此書則早在 1884 年即出版）。而且，在恩格斯生前，填補希臘早期文明史空白的克里特文明（1900 年出土）和麥錫尼文明（19 世紀末挖掘出土），都還沒有被發現和認識。因此，恩格斯就像當時的大多數希臘史家一樣，只能把荷馬史詩中的描繪看作希臘文明的早期型態，從而把希臘城邦國家看做一個剛剛進入文明期的社會。但事實是，恩格斯並不知道希臘社會在此之前至少已經經歷了 2000 年以上的文明歷程，因此他實際上是低估了希臘文明的發展水平。參見：何新，〈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書看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讀書》（北京），1986 年第 11 期，頁 40-51。

¹¹⁰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20-22。

¹¹¹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21。

德，同時少數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對世人全無恩澤，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了擁戴。隨後，有同樣才德的人增多了，他們不甘心受制於一人，要求共同參加治理，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政體。¹¹²

對於亞里斯多德的「才德人數增長」的說法，顧準予以反駁，因為亞里斯多德「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臘人的自由精神」。¹¹³顧準批評亞里斯多德的「美化」，反映出顧準對王制（專制主義）的厭惡，既然在專制主義之下，有才德之人增多怎麼可能會成為立憲政體建立的原因？同時也表明了顧準對民主普世價值的肯定，並且反對如亞里斯多德般地將民主產生之因與某一民族及其才德劃上等號。如此一來，也等於是為中國民主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¹¹⁴

第三種說法則是把古希臘民主與手工業發達相連繫的觀點。儘管顧準在其研究中並沒有針對此一說法進行解釋，但早在 1960 年代就已經被西方史學界所否定。例如學者劉北成在翻譯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歷史研究》一書的注釋中指出：「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西方史學界已拋棄這一觀點，即雅典經濟以工商業為主，公民集體的主體是工商業者。而認為雅典的主要經濟基礎是農業，公民大多數是農民。」¹¹⁵另外，赫爾德（David Held）在《民主的模式》中也提到古希臘城邦的公民主要組成人員是從事與農業相關的人員。¹¹⁶上述觀點意味著把古希臘民主與工商業、手工業發達相關聯的觀點純為後人的一種想像，隨著近代考古學者的挖掘成果出爐，這一說法的正確性便不攻自破了。

第四種則是歷史學家湯恩比的「契約說」，主張希臘民主係源於希臘人海外殖民時所形成的以契約為基礎的社會組織理念與制度，而這樣的論點也為顧準所理解、接受。在此，首先針對古希臘歷史進行簡要的介紹。在西元前 1200 年時，希臘半島南部曾存在王權政治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由於來自希臘北方多里安人的入侵而瓦解了。一方面，在原邁錫尼境內仍存在著王國，但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是分裂成一個一個的小國；另一方面，多里安人的入侵使一部份人被迫移居海外，到邁錫尼時代即已建立的殖民地去找尋機會，或者再開闢另一片新的殖民地。¹¹⁷希臘由於其天然的地理位置，海上文明十分發達，海外殖民活動

¹¹²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165。

¹¹³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9。

¹¹⁴ 徐先蘭，《顧準民主思想初探》（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¹¹⁵ 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97。

¹¹⁶ 戴維·赫爾德（David Held）著，李少軍、尙新建譯，《民主的模式》，頁 15-16。

¹¹⁷ 邁錫尼文明在內部與外在的因素下，在西元前 1100 年覆滅，文化迅速衰退。西元前 1100 年

已行之有年，而多里安人的入侵使得原有的海外殖民的規模更顯浩大。因此，正是在跨海移民的海外殖民過程中，產生了以契約為基礎的政治。湯恩比解釋道：

在移民建立的海外城邦中，新政治組織的「細胞」不是血族的同胞、而是船上的同伴。由於人們在海上曾面對危險，「同舟共濟」，所以人人合作。到了岸上之後，他們必須在沿岸艱苦取得立足之地，以應付陌生地域的威脅，所以在感覺上和行動上，仍然繼續合作下去。於是，在岸上便和海上一樣，同志的情操勝過了血族的關係，而大家選出並信任的領袖，所下的命令也超過了習俗的驅策。事實上，一群合力為自己在海外征服新地的船上同伴，很快便會變成一個由當地「部落」結合而成的城邦，而選出官吏進行統治了。¹¹⁸

綜上所述，這些海外殖民當他們從舊的王國脫離出來後，他們成了自己的主人，他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和行爲，可以自己治理自己。然而，在艱困的海外殖民過程中，在船上或新城邦裡，爲了降低敵人對自身造成傷害的可能性，他們於是選出一個可靠的領袖來領導大家集體行動。如此一來，移民就等於把治理自己的權力託付給了共同推選的新領袖，也由於領袖的產生是經過移民們同意才得以就任，因而移民與領袖間的實質關係是建立在契約基礎之上的。湯恩比這一以契約為基礎而建立新的政治組織的說法，明顯帶有啓蒙時代思想家所提出「社會契約論」的設想，對此，顧準說：「脫因比（即湯恩比）之採用『以契約論為基礎』這種說法，顯然也是有盧梭存在心中的。」同時也是「把古史現代化」。¹¹⁹

至西元前 800 年的整個「黑暗時代」中，希臘大部份地區的文化皆陷入低潮。當時大部份的希臘人變成文盲，有些人不堪多利安人的統治，紛紛逃至阿提加、愛奧尼亞地區建立許多城邦，如後才成爲希臘文明搖籃的雅典城。參見：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3-21；保羅·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主編，郭小凌、張俊、葉梅斌、郭強譯，《劍橋插圖古希臘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頁 62-66。

¹¹⁸ 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上冊，頁 273。

¹¹⁹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49。

大致而言，顧準所認知的湯恩比的「契約說」，可以概括為兩個內容：一、「立憲政體」，『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淵源於小亞細亞傳布到希臘本土。¹²⁰二、小亞細亞的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則產生於跨海遷移。¹²¹顧準將其研究重心放在第一點的探討上，顧準說：

當我們初讀希臘史的時候，對於他們遠古的王權怎麼會「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這種和平消失的過程，放在海外城邦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就不是什麼怪事 - 希臘本土諸邦王權的和平消失，原來是淵源於小亞細亞城邦的一種時代風尚。小亞細亞是當時希臘世界最先進最文明的地方，處在逐漸「現代化」過程中的希臘本土諸邦要追隨這種風尚當然是可以理解的。¹²²

顧準在思考、研究古希臘的契約理念和民主政體時，所對照的便是中國專制政治體制。如此一來，中、希兩國之間的不同特性與發展便被突顯出來，顧準尋求中、希差異就是為了說明為什麼是希臘產生民主。要之，當顧準贊同湯恩比的契約論，他的目的便昭然若揭，亦即，既然古希臘民主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追隨風尚的結果，這樣的說法等於也是為中國未來建立民主理想的前景開了一扇窗，因為希臘民主源於「外在」的解釋，無疑地讓顧準從歷史中看到了沒有民主現狀的中國，在未來建立民主的希望。

二、古希臘民主制度的演進過程

顧準研究希臘城邦史所關注的第二個問題則是：古希臘民主制度的演進過程。¹²³如前所述，通過希臘人的大規模海外殖民，「主權在民」的理念在海外殖民城邦已落地生根，即以契約為基礎建立政治社會組織已成爲海外小亞細亞殖民城市居民所認可和接受的觀念。而由於過去的習慣，海外殖民城邦在初期仍舊採

¹²⁰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9。

¹²¹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49-50。

¹²²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0。

¹²³ 一般而言，希臘的政治制度的演進大多數是由君主政體至貴族政治或寡頭政治，然後經僭主政制而漸至民主政治，這是希臘政治最完整的發展，而顧準的理論思路亦是遵循這一路徑來做評述。但須注意的是，並非每一個城邦皆是如此，也有許多例外，如斯巴達，即是從君主政體變爲寡頭政治，未曾產生僭主政治，最後也沒有邁向民主政治，形成一種滯固的寡頭執政。參見：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27。

用原來所熟悉的王政形式。但這個以契約為基礎的王政和原來邁錫尼時代專制主義的王政已大不相同，可以說，它正是走向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的起點。

顧準通過研究認為，自西元前八世紀以後，王權政治在演變為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歷經了兩個過渡政體——貴族政治和僭主政治。由王權統治遞嬗為貴族統治體制是發生在海外即小亞細亞殖民城邦中，而由貴族政治經僭主政治到最終形成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政治，則率先是在希臘本土城邦中完成的。之所以殖民城邦沒有實現由貴族政治直接轉向民主政治，主要是因城邦遭受到了外部的軍事打擊所造成的。而希臘本土接受來自殖民城邦的政治文化的影響，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時勢，最終實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變革。¹²⁴

在海外殖民城邦初期雖然實行的還是舊制度的王權政體，但它是一種比較獨特的王權形式，它類似於君主立憲制，國王的權力僅限於宗教和執行政策方面。這種王權是為迎戰戰爭和移民的需要，國王的任務是把各部族團結在一起，他必須以自己的為人和法律上的權力將他們統一為一體。顧準說：「王權是毫無基礎的，國王原來就沒有任何神授的權威，他不過是貴族階級中顯要的一員。」而隨著殖民城邦的「希臘化」，即來自希臘的移民增多，加上希臘移民與當地居民逐漸同化，也就是說隨著在契約基礎上建立政治組織觀念的認同人數的增加，「用不到什麼革命和政變」，王權就和平的「自然而然地消失掉了」。於是，貴族政治——希臘人稱為權門政治（Dynasteia）的寡頭政體——就取代了王權政治。¹²⁵當然，形式上的「王」依然存在，但「他沒有實權，更沒有特權，他的唯一替代不了的職務就是主持祭祀大典。」而對於貴族政治，顧準特別強調：「所謂希臘城邦的貴族政治，並不是傑出的一兩個貴族的『人治』，它是合議制的，它會發展出一套貴族這個階級內部的民主慣例，從而必須逐步建立起一套規章制度，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淵源，總之，這是『法治』。」¹²⁶綜上所言，儘管這只是城邦貴族所獨享的階級民主，而不是城邦公民的全民民主，但重要的是從王權政治轉為貴族政治的過程中，統治者的基礎擴大了，亦即掌握城邦政治的決策權和管理權的人數擴大了，這當然象徵著走向主權在民的民主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環節。

小亞細亞殖民城邦能夠走向貴族政治，與殖民者們所建立的社會組織為城邦國家是密切相關的。究其因，最初的希臘移民者來到小亞細亞各地後，考量安全等原因，他們必須「築城聚居」。這樣就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城邦國家，但為何這些城邦國家沒有演變成一個大王國？顧準將其歸因於海外殖民者們的「冒險家氣質」，或者說是「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的自立門戶的強烈願望，這種意念遂導致各殖民地走向「分裂繁殖」的擴張路線，而沒有在這過程中形成一個「政治軍

¹²⁴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6-57。

¹²⁵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42-51；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27-30。

¹²⁶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3。

事經濟的中心國家」。¹²⁷也正因處在這種小範圍的城邦國家中，民主方有產生的可能。

依顧準的看法，穩定的「貴族議事會統治下的城邦」的建立，標誌著城邦制度已基本確立了，雖然與標榜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還有一段距離，但促成主權在民的條件卻也逐漸醞釀成熟。海外殖民城邦由於受到外部軍事力量打壓未能繼續朝民主化方向發展，但位在希臘本土的城邦則受到海外殖民城邦貴族政治的影響，政治體制亦由王權轉向貴族專政。具體是如何轉變的？顧準說由於材料缺乏，其過程無法考證。但顧準著重強調兩個原因：一是海外殖民地城邦的先例示範，使「貴族階級起來消滅王政而成爲時代風尚」；二是海上貿易和手工業的發展，「這使得它工商業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動了貴族階級『現代化』。」¹²⁸

在古希臘時代，由貴族專政到城邦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體制，中間還經過了僭主政治。把希臘僭主政權視爲希臘民主化的一種必要的過渡型態，向來是學術界的一個公認，¹²⁹所謂「僭主」，是指未經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權的人，如掌握政權較久的行政官員或是野心家等，他們無視以前所存在過的政治體制，在竊取政權之後，實行一些有利平民的政策，然而政權不向平民群眾開放，實行的是獨裁政治。在古希臘的歷史中，從西元前七世紀初貴族統治解體開始，到西元前六世紀，在這一階段當中都可以發現僭主政治。¹³⁰

至於古希臘城邦體制何以由貴族政治轉爲僭主政治，顧準指出這是因爲當時貴族階級的寡頭政體無法應付城邦所面臨的兩大困境：一是存在「強大的外敵侵犯的威脅」；二是由於隨著殖民與商業活動的推展，財富增加，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和船主所組成的中產階級，他們所累積的財富逼近貴族階級，但「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愈來愈和各階級力量的對比相脫節」，因此他們逐漸起來要求政治權力，與貴族階層產生了衝突。¹³¹在這樣一個社會和經濟陷於動盪不安的年代裡，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府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出現，而僭主具有的不受拘束的行政權力順勢適應了這樣的需要。上述的兩大困境實際上預示了一個僭主如要崛起所必備的條件與情境，由於外敵侵犯的威脅導致軍隊地位的上升，軍隊中的主要精英

¹²⁷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37-49。

¹²⁸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59-61。

¹²⁹ 此處需要釐清的是，儘管希臘諸邦歷史演變過程有其一致性，例如此時期內許多城邦出現僭主政體，繼以推翻僭主，實行民主，顯示出歷史過程的某種一致性。不過，仍然有城邦並沒有出現僭主，而出現民選調解官或民選獨裁者這樣的角色，雅典的梭倫和米堤利尼的彼塔卡斯即是著名的例子；而也有城邦沒有發生政治動盪，和平地進入民主政體。參見：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81、108-109；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29；保羅·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主編，郭小凌、張俊、葉梅斌、郭強譯，《劍橋插圖古希臘史》，頁 139-142。

¹³⁰ 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29。

¹³¹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79-80。

領袖就最有可能成為僭主，而他所依恃的力量就是「無法忍受經濟上慘遭剝削和政治上絕對無權的農奴或平民」。¹³²

然而，由於僭主是一位篡權者，其統治的合法性極為薄弱，同時僭主為了維持自己的不合法的統治，最終往往會變成獨裁者，於是，「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又無例外地愈來愈陷於貪婪、殘暴與無能，這是『城邦的人』——公民所忍受不了的。」導致原來支持僭主上台的平民們又迅速地反叛他們，因而，在古希臘歷史中顯示的是，僭主政治只是一個短期的過渡性質的統治形式，即由舊的貴族政治向新的民主政體轉變的短暫統治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正是從貴族寡頭專政到民主政治的過渡作用。」¹³³

希臘僭主在古希臘時期，往往被視為是不合法的、非憲政的政權篡奪者，而永遠不能獲得「神授王權」的尊榮。對此，顧準認為希臘僭主是「城邦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具體而言，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希臘城邦是一些蕞爾小邦，一個城市及郊區就是一個國家，它們不像廣大的領土國家那樣，可以在王國中央建成一個住居著王室及朝廷以及為王室及其朝廷服務的形形色色人員的王都。」也唯有在這樣具有宏大規模的王都裡，「王權才能用輝煌的宮殿、神廟、儀仗、御林軍裝飾起來；又唯有有這些裝飾，『奉天承運』的謊言才能發生效力。」易言之，由於領土空間的狹小，「神授君權」的神話無法通過包裝、粉飾而產生；二、僭主於西元前七世紀興起時，正處在古希臘的「人文主義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希臘古代王權傳統已被航海、貿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義的文藝所摧毀，」而正值「貴族階級亦即知識階級充滿著一種『玩世不恭』的不信神的精神的時候，要把他們屬於他們儕輩的，只因爲手段高明，獲得了政權的僭主尊爲神佑的王是絕對辦不到的。」¹³⁴

抱著對民主的信仰與追溯，顧準進入了古希臘的民主研究之中，且在其論述當中，常見到他對古希臘文化透露著肯定與欣羨之意。例如，在寫到以雅典和斯巴達爲首的城邦同盟在希波戰爭中取得勝利時，顧準給予高度的評價：

這次戰爭的結果，充分證明了創造與發展的希臘文明優於停滯不前的東方

文明，雖然前者的歷史遠不如後者的悠久。也證明了城邦制度固然會在各

¹³²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107。希臘的貴族政治在西元前七世紀所發生的制度危機，除了有顧準所闡述的兩大困境外，還能補充一點的是軍事技術進步——古代騎兵的優勢爲重武裝部隊所取代。由於其擁有的裝備和武器皆勝於騎兵，因此在戰場上成爲常勝軍，各邦此時也擁有自己的武力，這些步兵的成員大都是由農民中招募而來的，他們的地位不斷的提升，促使他們要求在政治上擁有權力。由於此種要求很難達到，故也導致各城邦間發生嚴重的事端，使貴族不得不做出讓步。參見：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28。

¹³³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108。

¹³⁴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105-106。

城邦之間造成互不團結，然而城邦內部的民主制度，不僅在和平生活中發展了各個人的創造能力，在存亡危急關頭也把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對敵人作堅決的鬥爭，一旦外敵侵犯使這些城邦結集起來成為堅定的抗敵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戰勝在專制主義統治驅迫之下的，貌似強大，實際上是離心離德的帝國軍隊。希波戰爭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希波戰爭勝利以後，創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希臘文明從此躍進得更快，「古典時期」的希臘，是人類文明的極其光輝燦爛的階段，對後來歷史的積極影響是不可估量的。¹³⁵

然而，當他在《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中撰寫到古希臘逐漸走向衰亡、民主城邦被「外敵」¹³⁶所打敗之時，原先對古希臘城邦充滿讚賞與肯定的顧準，卻在此時陷入了他所說的「迷惘」當中。顧準對陳敏之說：

我寫《希臘城邦制度》，本來是有感於在希臘那種小邦林立，相互競爭中，個人創造性發揮到頂點，創造出燦爛的希臘文明，其中關於哲學、科學、文學的，至今我們還在深受其惠，所以要寫，是想歌頌它。可是寫著寫著，對於林立的小邦互相之間的自相殘殺，甚至不惜勾引希臘文明歷來的大敵波斯，而且這個波斯帝國，此時已經奄奄一息，而希臘則縱然在自相殘殺，

¹³⁵ 顧準，〈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頁 119-120。

¹³⁶ 此處的「外敵」係指位於希臘半島東北部以北的馬其頓（Macedonians），雖然馬其頓人將自己視為希臘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希臘文化在這裡受到高度的尊敬。而在希臘人的眼中，馬其頓不過是個野蠻落後的國家。馬其頓後來在亞歷山大的帶領之下統一了希臘半島與波斯帝國，其遠征足跡甚至向亞洲深入推進，率軍越過阿富汗攻入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個幅員廣大的帝國。參見：劉增泉，〈希臘史：歐洲文明的起源〉，頁 45-48。

還是方興未艾 - 對這種不顧大體實在受不了，不知該歌頌不，有點迷惘
來了。¹³⁷

顧準在北京的 1974 年 4 月 28 日的日記裡，更是用「卡殼」¹³⁸兩字來形容他此時寫作的困惑。顧準對民主的信仰不僅是因為認可「主權在民」，更是因為他相信只有在民主體制下，「多元化」才有可能實現，而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在多元的基礎上通過競爭與創造構築起來的。古希臘城邦制度就為這種多元化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充分的基礎與條件，進而創造出先進的人類文明。但為何這個文明先進的古希臘會被實行君主專制的亞歷山大帝國所打敗呢？甚至，顧準對照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同樣發現，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即戰國時期的文化中心——「齊魯大梁邯鄲」被處於關中地區的「半蠻族」——秦國所打敗了。¹³⁹面對眼前的歷史事實——在古代社會中，「先進的」總是被「落後的」所打敗——這對顧準就形成了一個理論上的挑戰。

不過，顧準在理論上很快地解決這個「迷惘」，針對古希臘城邦何以失敗的問題，他將民主制度與城邦生態分而論之，亦即，先進的希臘城邦之所以被亞歷山大帝國所打敗，不是由於其民主制度，而是由於城邦制度使然——城邦都是小邦小國，自然無力抵抗大一統的帝國。換句話說，失敗的是城邦小國，而非其內在的民主體制。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與傳播，顧準進一步解釋道：「在早期文明的歷史中，文明的創始和繁榮大都起於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之中。然而要使這些珍貴的人類精神財產大規模地傳播開去，軍事征服，以及軍事領袖的獨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要之，「沒有大一統，興起於一隅的文明不可能大規模傳播。」¹⁴⁰

基於對古希臘民主制度的肯定，顧準原先不免對小國城邦林立的政治生態大為讚賞，認為其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高度繁榮與發展。但通過上述對「迷惘」的解惑，顧準對政體與城邦、國家的關係又有了新的認識，他說：「做了這樣的考慮之後，我對於『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還是厭惡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實上，大國而不獨裁，在古代確實辦不到；但人類進步到現在，則確實完全辦得到……」

¹³⁷ 顧準，〈統一的專制帝國、奴隸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戰爭〉，載於顧準著，《顧準文集》，頁 186。

¹³⁸ 顧準，《顧準日記》，頁 433。

¹³⁹ 顧準，〈統一的專制帝國、奴隸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戰爭〉，頁 187。

¹⁴⁰ 同上註。

儘管古希臘城邦所發展出來的民主制度以失敗結局作收，但並沒有就此使顧準放棄對民主的信仰與追求，「迷惘」的解惑也使他對民主、文明的發展與城邦、國家間的關係有更清晰的視野。在顧準的歷史思想中，資本主義（或廣義的現代化）和民主政治是兩個最重要的議題，而他在古希臘城邦制度研究所帶來的啓示是：中國在「神授君權」的傳統，決定著唯有絕對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才能繼續發揚並傳播中國文明，但同時卻又使中國社會陷入長期停滯。而當古希臘與中國自「神授君權」的傳統分道揚鑣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文明發展。顧準所得出的思想成果，不單單是一種遺產，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種啓示和動力，即用一種更具批判的角度來檢視專制主義對中國文明發展所造成的遺害，而在探索古希臘民主的產生與演變之際，更導引出對民主肯定的現代政治訴求。惟令人遺憾的是，《希臘城邦制度》這一份來不及寫完的讀書筆記，不過是顧準這一宏大研究計畫的一部分成果，在還沒能做進一步的探究和闡釋，他終究無法敵過病魔的摧殘，燃盡了自己的生命。